

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

佟 新

【提要】 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表现为：第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成为移民主流；第二，虽然移民呈现多样化趋势，但劳动型移民是移民主体。这些过程反映了社会不断向着现代性的方向发展。社会的现代性是全球化和个体化的双重过程。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有机的结构性链条，这些结构性链条以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以及制度要素为主要的纽带促进着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个体化过程具有的鲜明的个人主义取向正全面地取代传统社会的集体主义取向，时空重组和各种抽离化机制为国际人口迁移打开了新的社会空间。移民网络具有的社会资本的特征推动民间社会源源不断的迁移浪潮。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蕴藏着各种危机与挑战，并建构着新的国际秩序。

【作者】 佟 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 90 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浪潮更有加剧之势。据国际移民组织估计，1990 年国际移民人数达到 8 000 万。到 1992 年，旅居国外的人数已突破 1 亿（卢德格尔·普里斯，1998），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这一时期的人口国际迁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我们有必要从它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加以理解和阐释。

一、国际人口迁移的新特点

所谓“新”是与传统的人口国际迁移相比较而言，新的国际人口迁移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与 90 年代不断加剧的全球化浪潮相互呼应，相互推动。

（一）人口迁移的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口国际迁移的流向是由宗主国向殖民地的迁移，60 年代后国际移民的主流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迁移，发达工业化国家成为国际移民的首选国。以美国为例，60 年代前的移民，82% 来自欧洲；90 年代后移民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主。整个北美地区，1960 年迁入的移民中拉丁美洲人占首位，达到 335 万人；亚洲次之，为 52.5 万；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为 5 万和 2.5 万人。1974 年迁入的移民中，亚洲移民人数上升到 170 万，非洲为 20 万。1978 年以来，亚洲成为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占移民总数的 40%~50%。1990 年，亚裔美国人有 690 万，到 20 世纪末增至 1 000 万。90 年代，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约有一半的新移民来自亚洲（斯蒂尔·卡斯尔斯，1999）。

（二）劳动移民成为移民主体。所谓劳动移民是指移民是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客籍工人式的人口国际迁移就是最好的例子。“客籍工人”是一种国际合同工，对于迁入国来说，客籍工人被严格地限制在合同劳工的制度内，一般不得定居或携眷属，不享有公民权或政治权，他们大多从事繁重的劳动，并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构成了迁入国最为廉价的劳动力之一，且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无力争取应有的权利。1989 年，西德有 170 万的客籍工人，英国、法国和挪威等国也有许多客籍工人（John R. Weeks, 1996: 234）。然而，对其迁出国来说，这一类型的劳动力输出不仅能够减少失业，还能够使劳动力得到训练和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劳工们还能够带来外汇收入，改善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水平。全球经济、信息和交通的一体化发展趋向，减少了客籍工人流动之中的交易成本，各国劳动

力越来越被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中,因此某国劳动力一旦出现短缺很快会吸引大批劳动力进入。1973年油价上涨后,大批劳动力迅速流向中东。1975年,中东地区的外籍工人达200万,同年外来劳动力占科威特劳动力总数的69.4%(Ismo Soderling,1997)。1985年,有320万亚洲人在海湾国家做工,其中200万以上在沙特阿拉伯。1985年后油价大跌,招募外籍劳工的情形减少。到90年代初,外籍工又恢复了昔日的水平。冷战结束后,俄罗斯1985~1989年的迁出人口数为16 000人,而1990~1994年则达到102 000人以上。从中国看,官方登记劳务输出人员从1982~1984年的每年37 000人增加到1990~1991年的每年135 000人(Hania Zlotnik,1998),增加了3.86倍。

(三)全球劳动力市场建构了多元化的新移民。新移民浪潮发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所缔造的统一国际劳动力市场在新移民的呼应下应运而生,两者互动的结果是使新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不断累积且充满活力。这个全球劳动力市场是个分化的劳动力市场。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前提下,不同的劳动力满足着不同的需求,由此建构了多元化的移民主体。

一方面,一个面向高素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全球一体化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有技术专长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后工业化社会,劳动力的新的国际分工显示出市场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长期供不应求。移民迁入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利用各种手段和优惠政策吸引高技能人才和商业移民。目前,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和更适合的发展到国际劳务市场上寻找工作。亚洲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人才产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纷纷迁移到发达国家。八九十年代,高技术移民的剧增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美国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直接吸引高级人才和各种人力资源(从1952~1972年美国引进外国专家22.2万人);另外还利用高等教育的优势吸引世界各国优秀的青年人才,1994~1995年,美国的2 500所大学中已有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留学生452 635人。中国1978~1996年共有留学生至少27万人,其中美国、加拿大占了57%以上(贾浩,1997)。

另一方面,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在满足着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大量的难民、非法移民以及女性移民成为这一低级劳动力市场的主体。1970年,世界难民总数为1 760万;1980年为1 400万;1994年达1 600万。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John R. Weeks,1996:235)。形成难民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是环境与生存压力导致了大批的生存型难民;二是长期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产生了大量的政治和战争难民。大批难民由于无家可归成为移民中最为廉价的劳动力。此外,各种非法移民由于其非法身份容易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剥削的一批人。90年代以来,女性迁移人口增加。到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国家约有150万妇女在国外工作。女性移民主要从事一些“典型的女性职业”,如家务、餐饮、旅馆、服装、电器组装、娱乐或性服务等。这类工作收入微薄,工作条件恶劣、地位低下,但却与男权社会要求的顺从谦恭相适应(L. L. Lim and N. Oishi,1996)。各国服务行为的发展也促使客籍工人女性化。对家庭佣工的大量需求导致了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合同式劳工移民的女性化(R. Skeldon,1992)。

总之,正在进行着的国际人口迁移正以一种全新的模式运作着。

二、对新型国际人口迁移的理解

如何理解这些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呢?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看,当透视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趋向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总体结构性原则,即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结构性上的特征。笔者认为,全球化和个体化作为现代性的两极,构成了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结构性原则。由全球化的一极和个体化的另一极来理解新的国际人口迁移有利于更深入地解

析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变迁。

(一) 从全球化的力量进行分析,各种经济利益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冲动将发达国家、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结构性链条联系在一起,影响和加速着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这些链条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本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致。以马斯等人(D. Massey, 1998)的研究来说,这些结构性的链条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在发展中国家各种结构性推动人口迁出的力量,二是发达国家各种结构性的吸引人口迁入的力量,三是那些响应这些力量的参与人口国际迁移的行动者所具有的动机、目标和志向,四是那些引发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相互联系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下面从市场经济、全球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力量三方面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链条。

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链条之一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冷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从欧洲、北美、日本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延伸,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被迫转型,以适应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涌现出一大批潜在的、渴望进入发达国家的移民。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渗透过程中,封闭社会被迫向开放社会转型,市场的引进和资本的扩充打破了边陲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更重要地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普遍地开始梦想改变原有的生活境遇,即新开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断被引诱着向外迁移,由此创立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国际迁移人口群体。这些人口群体富于冒险精神,积极地寻求增加收入的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群体或潜在的移民群体并不是由于某国发展的不足,而正是发展本身。某种程度上讲,世界体系理论对此有较强的解释力。它强调世界经济是如何用结构性链条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结起来,国际迁移的增长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

2.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链条之二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作。移民已成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历史延续下来的国际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结构性国际人口迁移的推动力和吸引力。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形成了少数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的统治,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上从属于发达国家,这一格局经过一个多世纪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关系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也趋于严重。但全球化把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当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就会转向使用移民,由此开启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发达国家的迁移链条,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提供地。

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着一个分割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即本国劳动力市场和海外劳动力市场相互割离,本国劳动力市场可称为高级劳动力市场,移民或海外劳动力市场可称为初级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在福利待遇和劳动强度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移民们多从事着高强度的劳动,享受着低福利待遇;同时具有巨大的弹性,一遇经济危机,这些处于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移民)便成为第一批利益牺牲者。可以说,以移民或海外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为背景的国际性初级劳动力市场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要求。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工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预期收益的吸引下必然会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因此,只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存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从人口稠密国家向人口稀少的国家的国际人口迁移就会结构性的存在下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初级劳动力市场有着相对无限的供给。由于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的非同步性,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处于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吸引力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和巨大的人口压力形成鲜明对比,促成了人口由发展中国家向发

达国家源源不断地迁移。

3.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链条之三是制度性原因。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力资本,使国家间的工资水平趋于平等。那么,人口国际迁移是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所致,这种非均衡状态源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上存在的国家间的差异。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而资本匮乏的国家,劳动者工资较低;而劳动力匮乏、资本丰富的国家中则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由此劳动力从前一类国家流向后一类国家,直到劳动力价格、需求量及供给量达到均衡为止。个人经过对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当预期收益超过成本时,人口就会为了得到预期的高额工资开始迁移,最终达到国家间工资收入水平的平等化。那么,各种新移民都是依循于“工资律”的规则吗?事实并非如此,一种劳动人口迁移的新经济学理论和家庭策略的迁移理论认为,国家间的工资差异并不足以促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要的是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相关的其他要素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发展激励等制度因素成为更重要的人口迁移的动力。在这种意义上,人口国际迁移的根本原因也许是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全球化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人们的生活是嵌入在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这些制度结构的差异对人口国际迁移更有作用。正是其他要素市场的失效,尤其是制度性要素市场的失效导致个人难以发展,家庭物质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因此人们通过人口国际迁移来改变自身所处的制度结构,并避免经济转型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家庭策略的迁移理论,这一理论强调迁移行为是一种家庭策略,家庭自觉地选择有利于全家发展的制度结构。迁移不仅使迁移者本身收益最大化,也为家庭提供了控制风险、增加资本的发展道路。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发生迁移的某一家庭成员的绝对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还会提高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证券、房地产和保险等非劳动力市场大多处在不完善的状况下,资本投资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因此一些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得资本、教育等稀缺资源,而迁移到其他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家庭比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迁移行为;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或地区比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或地区的迁移率更高。

(二)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极,即不断的个体化过程。全球化与个体化的关系有些像网络与PC机的关系。一方面,互联网跨越国家和民族,把全球所有的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坐在PC机前的个人既没有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也没有深入的亲密关系,人们只是孤独地会在电脑前与全球发生联系。新移民时代开始的关键在于社会总体性原则正从集体取向全面地向个人取向转变。那些带有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因素越来越直接地作用于个人。最明显地表现在观念形态上,现代生活对于“理性化”的强调加剧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所具有的巨大驱动力使个人脱离原有的生存环境,向着更好的物质生活迈进。由此,国际移民们深切地体验到了时空的重组。这种时空重组也在建构着新的社会空间(卢德格尔·普里斯,1998)。

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指出,“时空的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的拓展,……导致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变”(吉登斯,1998:2~3)。个体在抽离化机制的作用下,人们不仅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由此人们通过重新获得新的生存知识和经验来重建自己的生活。新移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移民网络的发展,这些移民网络不仅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本,还在于它是移民们在应对各种新的社会关系时可以借助的力量。

移民网络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迁移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是一些年轻人和高素质的人口,而是与迁入地人口有某些联系的人,由此“迁移者网络理论”被提出。这一理论强调迁移者和迁入地

已有移民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的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起着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收益和减少风险的作用。网络理论的概念也可以从个人扩大化至群体、家族、社区甚至国家,各种网络关系满足人类各种工具性目的以及情感性目的。波特斯等人对1973~1974年进入德克萨斯港口822名成年墨西哥移民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移民中大约有90%是通过在美国的亲人或与其有联系的雇主而获得在美国的居住许可的;70%的人曾作为非法移民在北美生活过,正是这段生活经历使他们建立起相关的社会网络,并通过这些社会网络获得了正式的定居证(A. Portes, 1995)。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用移民的乘数效应来预测未来的移民,认为每个新移民背后有一个潜在的移民群,至少是家庭链移民。有研究认为,每个到美国的移民背后平均至少有1.2个潜在的移民。

迁移网络理论认为,迁移是个不断生成社会网络的过程。在迁移过程中,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联系网络越来越密切,两地间的关系网络一旦形成,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网络式的人口迁移以自发式为主,不受短期经济变动的影响。在人口国际迁移中,已有的社会网络常常会促成新网络的发展,形成动态的自我延续。移民网络的自我维系过程导致了迁入地移民社区的形成,这种移民社区又进一步吸引了未来的移民。

三、新的国际人口迁移潜在的问题

新的国际人口迁移潜在的各种问题,是我们必然要应对的。

(一)从宏观方面看,人口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人口要素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要求下,国际人口迁移的力量是必须考察的要素。当今世界,人们不仅生活在经济和资源相互依存的时代,也生活在人口相互依存的时代。早在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就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它强调了人口要素与新的国际新秩序的关系,为了和平地发展世界经济,以人口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的目标是大幅度地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人口政策纳入到各国的发展战略中。新移民时代在全球化的作用不单单是某个或某几个民族国家的事情,国际人口迁移问题处理的好坏可能直接涉及到国际和平。从这点出发,应把人口国际迁移纳入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因为任何人口国际迁移都内涵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内涵着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适应、调适、冲突和同化,内涵着国与国相互关系的变动趋向。

(二)新的国际人口迁移凸显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国际人口迁移甚至直接威胁民族国家的存在。全球化的过程并非是在世界范围内一呼百应的事,实际上,它有着另一种相对立的趋势,即地方的强化。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称这种现象是一种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表明地方的生活与全球化的倾向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性的影响。对于移民来说,地方势力的强化预示着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抬头。

民族国家在移民增长的情况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常常会导致种族主义的增长。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反移民运动,多少带有一些种族主义色彩。当地居民常常出于对全球化和经济重组的恐惧将移民视为攻击对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率上升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焦点集中于移民身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言论,认为大批新移民抢了美国人的饭碗。1997年,欧盟对15个国家1.6万人进行了一项有关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近1/3的人表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有1/3的人表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族主义者。研究还表明,不同国家的殖民历史、移民历史和最新的移民动态与这种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程度有相关性。即使自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也有20%的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深受移民之苦。有43%的调查对象同意“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合法移民,如果失业了应当被遣返回国”的说法(谢晋宇,1999)。

种族主义可能会带来两种后果,一种是使移民成为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牺牲品。另一种是移民形成新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些群体由于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上,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因此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群体认同。在种族主义的经验上,一些少数民族的移民群体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

(三)全球化的主要建构者是那些有权制定和参与全球经济游戏规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无疑将主导全球范围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只要这种不平等的格局存在,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就难以消除。中心—边缘的国际迁移理论说明了这一点。该迁移理论认为,历史上与中心国家有过接触或遭受过它们的殖民的边缘国家往往会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往中心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各国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反映出美国对邻近它的边缘地区的扩张。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尤其是刺激了边缘国家人民的消费欲望。而边缘国家不断经历着被融入中心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过程,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向其迁移提供了动力和可能。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重塑过程。这个重塑过程的主导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从属地位将难以改变,甚至还会在强依赖关系中得以加强。

在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的同时,全球范围内或国家内部则不断产生着各种差异和边缘化的过程。因为在世界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将不得不处于越来越复杂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之中。在移民群体中,阶级、性别和种族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各种新的不平等的可能。各国的人口国际迁移政策是通过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来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它是行政的、法律的和公共领域的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结果。实际上,尽管发达国家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不断出台,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接受了相当规模的人口迁入。就总体而言,移民群体很难改变边缘地位,其权利也最易受损。

参考文献:

1. 斯蒂尔·卡斯尔斯:《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
2. 贾浩:《中国海外留学生面临的挑战与历史机遇》,《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第81页。
3. 谢晋宇:《9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国际迁移和国际迁移政策》,《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
4. 卢德格尔·普里斯:《跨国社会空间》,载[德]乌·贝克和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5. 安·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译本),三联书店,1998年。
6. A. Portes, 1995,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e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
7. Douglas Massey, 1998, "March of folly: U. S. Immigration policy under NAFTA," *The American Prospect* 37:22-33.
8. Hania Zlotnik, 199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65~1996: An overview,"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429-468.
9. Ismo Soderling, 1997. Life Management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 in Finland, 为第23届世界人口大会提交的论文。
10. John R. Weeks: *Popu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Issues*, Sixth edition, 1996 b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1. L. L. Lim and N. Oishi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of Asian wome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996, 5:1, pp85-116.
12. R. Skeld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and from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 review essay",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992 1:1, pp19-63.

(本文责任编辑: 朱 萍)